

反共作家？鄉土作家？或現代主義作家？

——朱西甯文學研究史小考ⁱ

陳建忠ⁱⁱ

摘要

本文試圖由「研究史」的角度，重新考察部分具代表性的朱西甯研究，由這些研究觀點引發如何評估朱西甯文學史地位的若干問題。由這些前行研究可得知，要研究朱西甯，首先需面對如何將美學高度政治化，也把政治高度美學化的朱西甯美學，辯證性地思考與把握。一向走自己信仰路線的朱西甯，他的反共文學、鄉土文學、戰爭文學，正是與主流的官方立場與文風走著「和而不同」的路線；然同時這種路線卻又在瀰漫著中國文明、民族文化的情懷裡，與台灣民間、本土的文學傳統與立場構成了既緊張又混雜的特殊關係。

朱西甯的文學，無可避免地與他流亡、軍旅、宗教、文化使命等際遇所形構的立場息息相關；甚且，他還堅持以一套形同信仰的理念來回應各種立場的挑戰，並未迴避與人論戰。那麼，刻意只談文化政治因素，或刻意只提純粹美學因素，這兩種研究取向，都難以兼顧到書寫主體所具有的複雜性。因此，關於朱西甯研究的進展，實在到了朝更有彈性而務實的方向轉變的時機。

關鍵詞：朱西甯、研究史、反共文學、鄉土文學、現代主義

ⁱ 本文為以「朱西甯文學研究」為個案，所進行的一次小型台灣文學研究史的考察。筆者在此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的諸多意見，但由於只是一次小型考察，對審查人的不少批評與期待難於在一篇論文中回應、實現。筆者受教之餘，當於未來持續進行相關的研究課題，以致力於「台灣文學研究史」的建構。

ⁱⁱ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Anti-Communist Writer? Nativist Writer? Or Modernist
Writer?: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Chu Hsi-Ning**

Chen, Chien-Chung*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examine parts of critical research on Chu Hs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studies, if we want to study on Chu, firstly, we should face the fact that Chu's aesthetics were highly politicized, and his politics were also highly aestheticized. Therefore, We have to interpret them with dialectical thinking. Chu had always stuck to his faith, his anti-communist, nativist and war literatures took the same direction with the mainstream in term of position and style, but not quite the same route.

The present research results were either swung to the cultural-political side or simply stayed on the aesthetic aspect but hard to concern on the complexity of the writing subject. Thus, it is the right and proper opportunity to make a flexible and pragmatic change on Chu.

**Key words: Chu Hsi-Ning, History of research, Anti-Communist Literature,
Nativist Literature, Modernism**

* Associate Professor, Tsinghu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一、序言：假語村言與夏蟲索隱

朱西甯（1927～1998）及其文學在台灣當代文學史上的定位，仍有待重估。甚且，對其作品的理解與詮釋，作者與讀者、評者之間的差距，也同樣有待重啟對話。

誠如創作歷四十年後朱西甯現身說法，在〈豈與夏蟲語冰？〉（1994）一文中明確指出，第一部反共小說集出版後他的創作風格轉變，與孫立人將軍¹對他的影響有關：

由是伊始，我的作品風向為之丕變，一為中國文明之飛揚，一為民族文化之承擔，至今三十餘年如一日；即反共亦衍變於無形而更長更闊更高更深。²

但他對論者將此種書寫志向下的作品，冠之以反共、懷鄉等名目，卻著實不以為然。並認為此舉乃學養不足、眼光短淺，無視於他思想的表露，也無能於意境表露的解讀。

再往前推幾年，朱西甯也在〈被告辯白〉（1991）裡頭第一次坦陳，他自己被稱為懷舊文學作家，並非所願，也非事實。半是因為白色恐怖使之然，但也有因共體時艱而「良知克制」不去寫會損害到國家利益的事物。只不過在這種壓抑下，他自認對那「家天下、黨天下、階級特權與專制」等非常時期必要之「惡」，卻仍懷「縮短其過渡，儘快減低其惡業而終須消滅之」的想法，於是如《狼》與

¹ 孫立人（1900～1990）將軍，曾任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參軍長等，為重要抗日將領。1955年以軍變之名被誣陷，被軟禁家中達三十年，受羅織牽連之部屬亦達數百人，為當年重大之軍中整肅事件，也是一樁白色恐怖冤案。至於孫立人精神，或說將軍所象徵的「軍隊國家化」等為國、為民之路線，一直被朱西甯所奉行，甚至時時在文本中巧為隱喻，因此對孫立人的相關理解也成為解讀朱西甯文學的重要關鍵。

² 朱西甯，〈豈與夏蟲語冰？〉，《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11），頁95。

《鐵漿》兩集都不外乎「維護必要，終滅其惡」此思想的產物。這正所謂「真事隱去以表達，假語村話以表現」，他自己要「一揭底牌」³。

如此說來，朱西甯倒是自認一直以來，他雖對創作意念多所壓抑（半因黨國極權，半因良知克制），但實在都寄託了某種理想於其中，只是夏蟲們「不解風情」而已。然而，王德威教授在〈一隻夏蟲的告白〉（1994）裡頭卻不揣以夏蟲自居，特別強調：「儘管朱西甯對反共、懷鄉等標籤多所質疑，卻無礙他在這方面的成就」⁴。直言這些稱號或標籤並非一種貶抑，卻正是他文學成就之所在（討論詳後文）。

但也正如黃錦樹所說，進入近代後的現代小說擔負著與國族建構不可或分的敘事認同效用，而建立在特定共同體的集體記憶上的敘事，卻可能難以讓另一個群體所普遍化地理解：

寫作者在選擇書寫策略的時候，同時也選擇了讀者，於是被指認為懷鄉之作，難免是寫給家鄉人看的，訴著同鄉的集體記憶以取得敘事認同……。就這一點而言，此間的、非同鄉的、不同世代的讀者，豈非宿命的只能是「夏蟲」？⁵

本文便認為，要理解朱西甯的文學，必然要將其以文學作為見證，作為信仰的思想根柢充分釐清，以免於夏蟲之譏。但，要考定其文學的成就，卻未必要循作者的指示而行，否則研究很難不淪為索隱。相反地，一向走自己信仰路線的朱西甯，他的反共文學、鄉土文學、戰爭文學，正是與主流的官方立場與文風走著「和而不同」的路線，亦即在國族認同與反共立場上相和，卻又別有懷抱；然同

³ 朱西甯，〈被告辯白〉，《中央日報》，1991.4.12，第16版。

⁴ 王德威，〈一隻夏蟲的告白〉，《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11），頁100。

⁵ 黃錦樹，〈隱藏的教誨或釋意的迷途：朱西甯小說的詮釋問題〉，朱西甯著，《破曉時分》（台北：INK 印刻出版公司，2003.4），頁12-13。

時這種路線卻又在瀰漫著中國文明、民族文化的情懷裡，與台灣民間、本土的文學傳統與立場構成了既緊張又混雜的特殊關係。

本文希望藉由對其各類小說的研究成果，以朱西甯不同次類型小說創作，在歷時性「研究史」上呈現的觀點，試圖在不同觀點間，尋繹出對其文風與思想的差異性看法。至於本文研究方式與範疇，由於隸屬台灣文學的「研究史」(History of Research)，但對於相關作家個人或議題的研究史的再研究，其實尚未完全展開，因此，本研究應當也是筆者對於歸納朱西甯研究所呈現出來的議題性，並在分析後期待提出對未來研究建議的一次初步嘗試，因此具有「初探」的性質，故稱對朱西甯文學研究的一次「小考」。

由於屬「小考」的性質，是一次初步的考察、考論，本文將無法涉及所有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僅能以具有代表性的論著先行展開討論。此處的代表性，某些情況下指的是時間上較早肯定或批評朱西甯文學的觀點，或是後續出現針對各類型小說進行翻案與修正的創新性觀點。經由這個小型的研究史考察，希望能藉此提出當前朱西甯文學與思想研究上可以著力之處。

二、反共作為志業：關於朱西甯反共與戰爭小說的研究

朱西甯的第一本小說集《大火炬的愛》(1952)，是典型的反共小說，一出手便獲得不少肯定之聲。不過，朱西甯似乎沒有朝向以爭取文藝獎金為主要目標而創作，這是有別於主流反共作家之處。或許，從寫作伊始，朱西甯即已顯露他對於反共志業的獨特思考，要以文字來為他所信仰的文化理念而反共。反共小說與論述，其實是朱西甯實踐其文化志業的手段之一。

司徒衛刊於《軍中文藝》(1954)第一期的〈朱西甯《大火炬的愛》〉一文，可視為軍中文藝系統對其反共小說的接受，主要便是肯定朱西甯提高了自由中國文藝運動之戰鬥性的文藝水平：

在文藝陣線上，他給我們帶來輝煌的戰績，一本份量沈重光芒閃爍的文藝作品。信念、理想、與創作的才智凝為一體，他實際的戰鬥生活和創作實踐契合一致，作品裡的戰鬥性自然就有優良的天賦。⁶

朱西甯以反共小說在文壇出發，對一個出身軍伍，且對民國動亂、國共內戰有著深切體驗的軍中作家而言，這毋寧是極其自然的事。但是，朱西甯雖也寫共黨之惡，與光明戰勝黑暗等主題，但他對於反共小說似乎別有堅持，不只在文字風格上力求兼顧藝術性，也對事件中的人性糾葛著墨更多，這使他的反共小說透露出不只是單求反共的多重意指之可能。

對此「反共作家」的標籤，離小說發表四十年後，王德威於〈一隻夏蟲的告白〉當中，提及朱西甯強調自己身為孫立人將軍的部屬，對國共內戰與流亡以來的歷史敘述乃別有看法，從而「見證」著另一種不為人知的歷史。王德威詮釋說：「他的反共信念是別有寄託的反共信念，他的懷鄉故事是『不得已』的懷鄉故事，他的軍事小說是失去了英雄的軍事小說」⁷。

作者與論者想揭示的重點，都在於朱西甯認為自己所寫的反共與懷鄉諸作，不能只從題材解釋而與一般的反共、懷鄉之流混為一談。他別有懷抱，他的反共與懷鄉文學不同於流俗之見。

然而，我們是否能說，這些反共、懷鄉、軍事小說，無論是朱西甯或當時更多的同類型作者，他們其實都共享者同一個歷史，只是各自的立場與角度不同。朱西甯所期待讀者區辨的寄託與差異，有如要讀者先行認同寓意更高一層的朱作，而將主題直露的應時之作無形中加以貶抑。這對讀者來說，不免是一種為難。其實，這種派系與觀念之間的差異，對稍知國府黨政歷史的人來說並不陌生，既

⁶ 司徒衛，〈朱西甯的《大火炬的愛》〉，《書評集》（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9），頁29。原刊《軍中文藝》1，1954.1。

⁷ 王德威，〈一隻夏蟲的告白〉，《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頁102。

有擁護孫立人的朱氏，當然也有擁護蔣家的其他人士，於此，我們或更可看到小說創作中潛藏的政治脈絡。

同時，對上述的一番討論，我們更該留意的，毋寧更是朱西甯對於自己信念與立場的堅持，並將之上昇為一種猶如宗教般的信仰，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對我們理解朱氏在台灣文學史中，各種論戰場合所代表的意義，會有極大助益。也就是說，他與流亡的國府並沒有根本上的文化信仰與國族認同上的矛盾，不過與官方在某些思想路線與文學的確也存在著路線上的矛盾，孫立人案或供養胡蘭成等事作為癥結，可以解釋這種「和而不同」的狀態。但是，他與帶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反新帝國主義的鄉土文學，或是殖民時代傳統以來具後殖民色彩之鄉土文學，卻有根本上的理念矛盾，審視他對鄉土文學的批判以及帶領「三三文學集團」（下開朱天文、朱天心、蕭麗紅等世代的文化中國信仰書寫，及其轉型）當可以一窺究竟。

因此，朱西甯的反共志業並非偶一為之，甚至是他一生文化信仰的基礎所在。針對這點，應鳳凰的〈朱西甯早期小說及其反共文學論述〉（2007）一文，便顯示出其重要性。此研究留意到朱西甯不少的反共文學論述，並結合其早期小說進行深入討論。本文的重要之處，在於提出不能只觀察小說家朱西甯，而必須留意朱西甯在文學場域中扮演的編輯者、論述者等角色，方能對其在台灣文學思潮演變中的位置有準確理解，而不至於將朱西甯的地位不夠重要一概歸之於寫實主義與政治正確等純粹外緣因素的作用。

應鳳凰點出，在二十餘年的軍中生涯裡（朱氏在 1972 年退役），貫穿了五、六〇年代，朱西甯是職業軍人，所任職位亦多不脫軍中文宣業務，如曾主編軍中《新文藝》雜誌，任職國防部隸屬之「新中國出版社」，擔任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部總編輯。甚且，在當時許多軍中與民間之文學獎中也擔任評審工作，提攜不少包括朱家姊妹在內之年輕作者。因此，應鳳凰特別提醒：

朱西甯在六、七〇年代文壇所扮演的編輯與出版，評論家兼文學獎評審的多重角色，就「國軍新文藝運動」發展階段而言，正是佔著一個有利的，優勢的「推手」的位置。⁸

對於朱西甯在歷次的文學論爭、文學座談裡，為其反共文化志業所做的辯護與自我檢討，如他的〈我們的政治文學在哪裡？：談中國的政治文學兼論當前的文藝政策〉（1977）、〈論反共文學〉（1977）、〈回歸何處？如何回歸？〉（1977）、〈論戰鬥文藝〉（1978）、〈光輝永續的反共文學〉（1994），及《聯合報》舉辦之「五〇年代反共文學座談會」上的發言（1980）等，在在說明朱氏對於反共文學之作為文化復興、文化永續工作一環的信念。也因此，他並未覺得反共文學之提倡與創作有何問題，應當糾正的乃是過於直露與僵化的反共書寫模式，而需要批判的則是脫離民族文化與挑動階級鬥爭的鄉土文學思潮。朱西甯對於反共文藝、戰鬥文藝思潮的擁護心切，其實超過了為其打抱不平的諸多論者的想像；而刻意忽略這些重要的反共思想，恐怕亦無能於復興朱西甯的歷史定位。因此，應鳳凰也再次提醒，正視朱西甯的反共文學論述，可能會「意外地」促使朱西甯被文學史家重新發現其特殊角色：

…相信朱西甯有生之年為「反共文學思潮」的正當性所做的努力，將釐清反共文學在目前各文學史書呈現的模糊面貌，促使未來的文學史書寫，多留心「反共文學」的正確歷史位置。果真如此，朱西甯或許會以連他自己也十分意外的另一種方式，走進文學史。⁹

在七〇年代初退役後，朱西甯完成一批以戰爭與軍事將領為題材的作品。陸續出版的《將軍與我》（1976）、《八二三注》（1979）、《將軍令》（1980）等，可

⁸ 應鳳凰，〈朱西甯早期小說及其反共文學論述〉，《五〇年代台灣文學論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7.3），頁 240。

⁹ 應鳳凰，〈朱西甯早期小說及其反共文學論述〉，《五〇年代台灣文學論集》，頁 242。

說是其戰爭小說的系列之作。至於屬於較早期完成之反共文學作品，也在稍晚結集成《海燕》（1980）出版。可以說，至少在過去三十年間，朱西甯寫反共或戰爭的題材，實為其創作的一大重點。至於不願意承認自己只是「那種」反共作家或懷鄉作家，也只能是作者自為詮釋下的辯解，實無法與無須否認文學身世與軍中身世的關聯。

離開軍伍以後所寫的作品，卻又與戰爭事件與文化密不可分，大抵可以顯示朱西甯所置身的書寫脈絡所在。《將軍令》就是此一時期完成的作品。朱西甯在書序中提到他的理念：

戎馬生涯二十餘載，身受軍旅栽培造就，卻于國恩無報，悵然在懷。解甲前後雖曾以十年光陰完成《八二三注》，也算嘔心瀝血之作，然也猶未盡申感恩之情。而最是有緣隨從多位上官將軍，皆人世裡不可多見的尊貴之人，有幸受其教誨、被其薰陶、沐其風範、仰其節操，莫不令我終生難忘，受用不盡。...看我所隨從的多位將軍，勳業彪炳可入青史，不必我來多費筆墨，我寫《將軍令》，意不在為諸位將軍立傳揚名，還因我受益殊深，未可獨享，不過藉其片言微行，瑣屑軼事，將我身受的春風雨露與人分露共享罷了。¹⁰

書中不同篇章所塑造的將軍個性並不相同，但都在強調其智慧與文化教養。比如〈智篇〉描述一位有新儒家風範的將軍形象，具備深厚的中國傳統禮教觀，讓人如沐春風。又如〈法篇〉中的將軍，展現軍人重視中國歷來的精神教化之功，而能達到「天人合一」的氣節與操守，並有與共黨軍隊持久抵抗的信念。這些個案最後都可以集合為一種朱西甯的信念，陳國偉便指出，朱西甯刻劃這些將軍們的背後：可以發現一個更為基本、更為終極的將軍形象，一個完整的「典型」，

¹⁰ 朱西甯，《將軍令》（台北：三三書坊，1980.01），頁3-5。

一個「總體」，正是將軍們呈現出來的「共相」¹¹。

此外，朱西甯針對發生於 1958 年的金門「八二三炮戰」，以六十餘萬言完成《八二三注》此長篇，並在七〇年代出版，應當可視為他頗為重要的戰爭小說，卻似乎未受到太多關注。然而，數年後因改編為電影劇本等問題，中央電影公司導演丁善璽便曾撰文批判朱西甯，認為朱所寫為「假戰鬥文藝」¹²，這等於是同一系統內的路線之爭，話題沸騰一時。

吳達芸曾有兩篇論文探討《八二三注》，分別是〈在君父的城邦：朱西甯《八二三注》的書寫策略〉（2001）及〈書寫在異鄉：再讀朱西甯及《八二三注》〉（2003）。在朱西甯過世不久後的這兩篇長文，重新提醒了讀者必須關注朱西甯曾經與反共、軍方、戰鬥等歷史有著密切關連的重要經歷。

吳達芸認為，《八二三注》出版甚久，但所獲致的回應「人不敷出」。有反共文學的擁護者的掌聲，但是導演丁善璽則揚言要求朱西甯「放下你的面具」，認為會「導致一般觀眾感染到假戰鬥文藝的病態」。吳文並認為，朱西甯是由基督徒世家、儒教家風及軍人身分三種特質所浸淫塑成的人格型態，「所以他雖然寫的是小說，秉持的卻是在君父的城邦，循規蹈矩、服從執行、無私無我的使徒（基督宗教）與史官（儒教）的傳道傳真精神」¹³。

吳達芸強調，朱西甯的〈被告辯白〉與〈豈與夏蟲語冰？〉兩文，揭露了自己的特殊寄託與寫法，但卻也為讀者帶來諸多困惑：究竟何者為真？是神化領袖為真？抑或明褒暗貶為真？¹⁴論者指出在《八二三注》中藉由神話老蔣，使其出現呈現無聲戲的扞格狀態，原來是為了對「孫立人將軍案」的不平申冤，對老蔣積怨沉浮於作品之中，可見其城府之深。但，文中也認為，這種筆法正是作家對

¹¹ 陳國偉，《朱西甯系列小說研究：文學生命的寂寞單音》（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0），頁 68。

¹² 丁善璽，〈朱西甯，放下你的面具！〉，《獨家報導》第 11 期（1987.03），頁 102-108。

¹³ 吳達芸，〈在君父的城邦：朱西甯《八二三注》的書寫策略〉，《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12），頁 275-277。

¹⁴ 對於小說中的「偉人」，張瀛太的研究也頗可參考，請見其〈文學中的戰爭與偉人：論《八二三注》的寫作意義〉，《國文學誌》第 7 期（2003.12），頁 261-283。

他自己看見/相信的歷史所做之見證，可以說，未必真實，卻也留下諸多戒嚴時代的印記。則閱讀這戒嚴時代的小說便有如「偵探小說」一般，恍然有了解謎與迷路之各種可能的興味。

吳達芸隨後又有一文〈書寫在異鄉：再讀朱西甯及《八二三注》〉，由「反共的時代結束」的位置來重新評價這部作品，希望在一個不反共的時代提出一個新的解讀可能。文中特別提出小說具有「異鄉書寫」與「反戰書寫」的立場，因而表露出他與國府主流觀點無法融合的處境，卻也成就他文學的獨特風格與價值。¹⁵本文較諸前文之討論其策略，更直接肯定朱西甯不同於官方主流思考的立場，由此肯定了本作在「後反共時代」的重要意義。

相關的研究都指向，朱西甯絕非不適合被冠上軍中作家或反共作家的稱號；相反地，這種將反共文學、藝術性與民族文化復興相結合的文學思想，說明了朱西甯如何有別於黨國主流的文藝觀（在主流中的非主流文藝觀），但也異於七〇年代後「回歸鄉土」的文藝思潮之差異所在。朱西甯身為反共與戰爭小說、論述的重要作者，理當期待未來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會越來越蓬勃。

三、流亡的鄉土與民族文化：關於朱西甯鄉土（懷鄉）小說的研究

朱西甯的鄉土小說，緊接著在他的反共小說後出場，成為他文學創作上第一個高峰。可以說，朱西甯或許透過反共與戰爭小說、論述，可以表露他對時局與文化的某些立場；但，真正能在藝術上獨立地揭露他自己對於人性與文化之見解者，復能在戰後台灣文壇建立其小說家地位的代表作，仍須推這批主要創作於六〇年代的鄉土題材小說。此類型主要的作品有：《鐵漿》（1963）、《狼》（1963）、《貓》（1966）、《破曉時分》（1967）、《旱魃》（1970）等。

司馬中原與朱西甯，堪稱是冷戰時期台灣文壇中書寫中國鄉土小說的代表作

¹⁵ 吳達芸，〈書寫在異鄉：再讀朱西甯及《八二三注》〉，《紀念朱西甯先生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05），頁 69-71。

家。將中國的鄉土民情鋪陳再現，不只是鄉愁的坦露，同時也在情節與人物的塑造中，凸顯作家在家國飄零下特殊的價值取向。由司馬中原來談朱西甯的鄉土小說，〈試論朱西甯〉（1963）¹⁶此篇可說是一個文學知己的會心闡釋。

文中所論《狼》一書所收作品就創作時間而言，從〈未亡人〉（1951）到〈福成白鐵號〉（1963），可看到朱西甯長達十二年間的文學發展。論者便依時間分為早期，過渡期，近期，作階段性綜合品評。

司馬中原認為，在作品契入的角度上，朱西甯似乎在東方——民族生存和延續的大環境中尋求其思想的站立，作為他作品的支柱；他放棄了時間形成的歷史表態，僅將其安置在作品次要位置，認為若就時間觀點上看現代，現代瞬即化為歷史，故他僅僅掌握住人類內在的靈明和愚昧，書寫他內在的大愛，作為他作品主要重心。從《大火炬的愛》到《狼》幾乎全置於民族生存，繁衍，延續的大環境之下，以他最熟悉的事物作為背景，向四面八方展射的：

他筆下的人物，代表著民族傳統的兩面：一面是躍動向前的，一面是停滯的；這兩者觀念的衝突，成為民族悲劇之主要導線。因此，他每篇作品都有著悲劇的延伸性，……，朱西甯作品的最大特色就在這裡，他不認為悲劇是一種個體的終結，而是群體醒覺向前尋求希望的起始力量。本此，他無時不在冀求引昇人類，穿過痛苦進入慰安，同時他告訴人們一點一滴尋求「更新」與「建造」的艱難。……因此，他最品中所表現的生活面是沛然驚人的，在和他同時代的作者中，還很少有人能與其相提並論。¹⁷

司馬中原認為「早期」的朱西甯在作品〈海燕〉、〈三人行〉的思想與表達間

¹⁶ 本文另有一副標題：「寫在當代中國小說叢書之一《蛇屋》之前」，但實際出版時，這本小說集卻名為《狼》。此小說叢書為司馬中原所編，第一輯第一種出版的除朱作外，尚有司馬氏自己的《靈語》，和段彩華的《神井》。

¹⁷ 司馬中原，〈試論朱西甯〉，《文壇》第42期（1963.12），頁21。

是有著較大差距的，這種不均衡的現象主要植因於他內向的性格。朱西甯於 1957、58 這兩年間，推出了他「過渡期」的產品〈驟車上〉、〈祖父的農莊〉、〈生活線下〉、〈再見！火車的輪聲〉、〈偶〉等多篇。這一時期的朱西甯，擴大了他取材的範圍，使思想的觸角進入各種不同的客觀世界，面對每一篇作品，則力求收斂，講求精度與純度，和自然的呈現，比之早期力求鋪放和費力的架造，顯然更進了一步。

1961 年至 1963 年間他發表〈偷穀賊〉、〈狼〉、〈蛇屋〉、〈白墳〉、〈紅燈籠〉、〈福成白鐵號〉等重要作品。特別是在頌揚〈蛇屋〉這篇作品時，司馬中原認為朱西甯創造了一個民族的熱愛者——蕭旋，更通過蕭旋，抒發了作者生命本身以及同時代青年群對於生命的回溯與展望。蕭旋從他白山黑水的家鄉，從義勇軍奮鬥的行列，到成為保衛祖國的行列中的一員，他旺盛的心臟與祖國同時起伏，他每條賁張的脈管全注滿民族的熱愛。來台後，蕭旋受命進入山區，擔任組訓民眾工作。為了感化「山胞」，革除積弊，他以堅忍卓絕的毅力達成了他所擔負的使命：

對於高山民族——偉大中華民族中的一系，對於他們物質文明的低落，觀念的保守，生活的骯髒，蕭旋全能忍受，他以對整個民族的愛心洗淨它們，並從綠蛇——那山地同胞古老神秘觀念的象徵中，盡力尋求他們的美點，即使他受蛇（觀念）所咬而斷指，他仍然那般熱愛著他們。¹⁸

關於感化原住民的部分，我們看到朱西甯基本上未脫民族主義與進步主義的觀點，犧牲奉獻的精神其實最後還是為了成全中華民族大業之完成。司馬中原雖未能指出其中的族群偏見，但這恐怕也是當時弱勢族裔知識貧乏的作者所難以避免的盲點吧。總之，廓清了中國與台灣鄉土裡的舊傳統，中華文化方有希望，成

¹⁸ 司馬中原，〈試論朱西甯〉，頁 27。

為朱西甯鄉土小說的重要題旨。

不過，正如本文「序言」曾提及的看法，朱西甯自認對鄉土裡傳統文化與問題的描寫，主要是基於除惡，而非懷舊。但，不少讀者卻未必能直窺其妙，往往只執其一端，未解風情。無論是作者擁有解釋權，或是讀者與評者偏愛僅取所需，總之，這種幽微的「撥亂反正」題旨，往往無法為讀者有效掌握，而更需某種程度的爭辯與對話方得逐漸明朗。

魏子雲的〈評〈狼〉〉(1962)一文，是學院中比較早為朱西甯爭議性作品予以聲援的論文。針對不少讀者認為文中乃在譏嘲二孀之淫亂，魏子雲反認為這是在表現「對一名不育婦人的母性心理之值得同情」。甚且，對小說結尾的和諧處理方式，魏子雲更以儒家思想為之闡釋：

中國人受儒家思想薰陶至深，故待人處事。無不以仁人之心存忠恕之道。所以我們中國人最講求容忍的工夫。〈狼〉所歌頌的便是諧和在中國社會上的傳統思維，極顯然地，作者在懷念著那個諧和的社會。¹⁹

魏文的評斷，已是試圖站在作者角度為之開脫，認為朱西甯不只對母性有所體會，也對傳統儒家文化甚為懷念。但，若就朱西甯自揭底牌的說法：「〈狼〉的直指執迷於嫡系已出之愚，乃至內鬥內行，外鬥外行之蠢；試就你所知或許不詳的孫案拿來對照一下看看」²⁰。這麼一來，不只說明朱氏鄉土小說之主題難於即刻通曉，連魏子雲之說亦尚差一間；甚且，我們要問：究竟是評者將小說讀為「懷舊」比較不解風情、拘泥於族群意識？或是作者本身這種「寄託遙深」的政治諷喻更具備政治意識？看來，傳統文化意識與政治意識兩方面的可能性，都是閱讀朱氏小說必須放在口袋中的兩個路標。

¹⁹ 魏子雲，〈評〈狼〉〉，《偏愛與偏見》(台北：皇冠出版社，1965.08)，頁27。

²⁰ 朱西甯，〈豈與夏蟲語冰？〉，《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頁96。

尚有，柯慶明在〈論朱西甯的一本短篇小說集：《鐵漿》〉（1968）裡的闡釋，亦在很早就肯定朱西甯的鄉土小說在面對傳統時自有獨到的見解。柯慶明認為，作品中朱西甯追尋著傳統的改變與繼承問題，想在對立的傳統社會與現代文明中搭建起一道過渡的橋梁。以致於將這樣的求索也延伸至《破曉時分》，及敘述兩代之間困難的長篇小說《貓》。可以說，較早結集的《鐵漿》標示著這樣蛻變的完成。鄉土社會中的悲劇英雄，正式擔當起拯救社會，喚醒眾人的悲劇角色，也正是朱西甯面對傳統與現代的一種態度：

洋溢在《鐵漿》這一本短篇小說集中的是一片悲劇氣息，而且大部分說來都具有古希臘悲劇的意涵，一種或可稱為血氣英雄的人物與命定環境的抗衡，構成朱西甯小說中「動作」的中心。……他們是少數份子，通常在社會上並不得到同情，而且往往他們所面對的不只是一個惡意的社會而已，另外還有冥頑莫測的命運，嚴酷的自然，還有自身糾纏不清的弱點。假如說他們之於那個並不理想的社會或者生存情境具有什麼意義的話，主要的就在於他們保留了一種「猛志固常在」的抗議，把這種抗議的英勇形象深深印到另外一些較弱小者的心目中。²¹

在論《鐵漿》一文中，柯慶明充分發揮了文本細讀的功夫，並一步步導向朱西甯小說中對人類命運與性格的思索等基本命題。柯文闡釋極為精細，認為當朱西甯向形成現在基礎的過去探索時，他發現了傳統中國鄉土社會中的鄉土人物和血氣英雄，接著他意識到要承繼這樣一個過去的困難，尤其是糾結在這一塊黃土上的人生竟然是充滿各式各樣的悲劇的存在，格外令人茫然。在迷惘中朱氏更進一步發現了是人類具有這種悲劇的本質，而不只是過去產生了悲劇，這終於達到

²¹ 柯慶明，〈論朱西甯的一本短篇小說集：《鐵漿》〉，《境界的再生》（台北：幼獅文化事業，1977.05），頁 404。原文刊《新潮》第 17 期（1968.06）。

一種欲說還休的悲慨。

可以說，朱西甯在他的鄉土小說中，的確思考了中國文化與國民性格等根本議題，並且在悲劇感中呈現出他的疑問與批判，顯示了他自覺承擔起知識分子關切國族命運的積極角色。

張素貞的〈試探朱西甯小說的主題意識〉(1985)，應當也算是學院研究者較早專論朱西甯的代表論作。重點在於綜論朱西甯小說的主題意識，提煉、提示了諸多朱氏小說的重要主題路線。

論者認為一位小說家的書寫經驗來自於想像經驗以及實際經驗，得力於平日的精細觀察，並於小說中展現出來，同時：「朱西甯的小說，不論取材、表現手法、語法、都是民族文化本位的，具有濃厚鄉土味與東方色彩，而且每篇各有風貌，技巧運用也往往各不相同」²²。

論者發現朱西甯的小說特質具有「悲憫人性的愚拙脆弱」，在朱西甯的小說轉趨成熟的時期，1957年他寫了「在驛車上」，以幼童第一人稱的敘述觀點，描述馬絕後的撿小便宜、玩小心眼、損人肥己、縮頭怕事、自私自利還理直氣壯。提醒人們面對自己的缺陷，能警醒而省悟猛改，作者挖掘人性的缺陷，充滿了悲憫的情懷。因而，這種借鄉土人物與背景，直趨人物心靈善惡問題的書寫方式，便成為朱西甯作品重要的主題：

細看朱西甯的作品，在多采多姿的小說世界中，隱隱然可以發現一條貫串的主線，那便是：深入探討人性的複雜矛盾，愚拙脆弱，有意無意留下悲憫的感喟；要以小說家真知實感的智慧，激引讀者的情感，體驗現實人生的萬般滋味，參悟人生的奧秘，培養貞定的情操，進而提升人類靈明的心性。²³

²² 張素貞，〈試探朱西甯小說的主題意識〉，《細讀現代小說》(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10)，頁82。原文刊《文風》第45期(1985.05)。

²³ 張素貞，〈試探朱西甯小說的主題意識〉，《細讀現代小說》，頁83。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對提升人類靈明心性的思想來源，提到「宗教力量」與「宗教思想」的作用，可惜尚未深入剖析。關於朱西甯文學思想中的宗教意識，連帶台灣的宗教文學與作家，確然還是研究者有待開發的領域。

至於因研究朱西甯，而引起朱氏的種種反響並撰文回應的王德威，則是對朱西甯的鄉土文學與歷史意識別有說解，進一步確立了朱的文學史定位。只不過這種以鄉土或反共為標籤的文學史定位，倒是引來朱西甯多次的不同意見，總認為評者尚未能得其文學之妙。

在〈鄉愁的困境與超越：朱西甯與司馬中原的鄉土小說〉（1991）裡，王德威將朱與司馬的鄉土小說置放在兩岸的華文小說傳統裡，力陳他們兩位是台灣鄉土小說由「思故土」過渡到「念本土」階段，最值得注意的作家：「我以為他們的鄉土作品，上承三、四〇年代的原鄉視野，下接王禎和、黃春明等的本土情懷，在文學史的傳承關係上，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²⁴。姑不論這種大中國史觀下的文學系譜連結，將中國大陸時期鄉土文學、朱西甯與黃春明歸檔為同一個「文學史」之下，是否有過於牽強之嫌²⁵，王德威主要強調的是朱西甯如何以宗教啟悟的方式來解決鄉土人物與環境苦鬥的難題，但正因如此，也顯示原鄉的漸行漸遠，只能在紙上心中以鄉土寄託他們對家國、文化的各種期盼，他們真正的難題是：「要如何說服下一代的讀者，『真正』的故鄉是在海峽彼岸？是在《荒原》與《旱魃》所呈現那樣的世界中？」²⁶。

而王德威另一篇〈畫夢紀：朱西甯的小說藝術與歷史意識〉（2003），可能更是他對朱西甯文學的重量級論作。王文中值得關注的看法，在於重申朱西甯與軍中、反共、懷鄉的關係，正是他文學能夠成其大的關鍵，這與筆者本文一再強調

²⁴ 王德威，〈鄉愁的困境與超越：朱西甯與司馬中原的鄉土小說〉，《小說中國》（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3.06），頁 279-280。原文刊於《中央日報》，1991.4.12-13，第 16 版。

²⁵ 筆者在本處指出王德威將朱西甯、司馬中原視為承先啟後之人選，藉以傳承「文學史」上的鄉土文學傳統，乃具有「大中國史觀」，主要著眼於王禎和、黃春明等台灣作家被編入一個「先驗的」所謂中國現代文學史想像裡而言，這未必符合很多台灣意識文學史論者的看法，但不妨視為一種具有影響力的詮釋觀點。本文目的只在指出其特點，並無進一步褒貶之意。

²⁶ 王德威，〈鄉愁的困境與超越：朱西甯與司馬中原的鄉土小說〉，《小說中國》，頁 296。

重視朱西甯基本美學與政治立場的觀點有若干相合之處。同時王文也認為朱氏的現代主義作品並未十分成功，受影響或相關之痕跡明顯，相反地，他的鄉土小說中的許多思考方式已證明他是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家，甚且也帶有存在主義風格。文末，王德威極力推崇《華太平家傳》(2002)為他後期最重要的創作成績，當中所延續的中國抒情傳統，在一片中國新文學傳統之「文學反映人生」的口號中，這種「反」的書寫模式似乎更具有美學與倫理價值：

在他地邈展開的原野長卷裡，朱藉心中典範人物，點染理想圖式。他的一片民國江山，最後落實在鄉野、民間、日常生活的實踐上。這是他抒情的極致了。而這抒情的極致，借用沈從文式的話來說，就是生命「神性」的顯現。²⁷

依據王德威的論點，朱西甯似乎以抒情的方式，將他一生反共、延續文化傳統的志向完全實現在這一烏托邦情境裡，而這比起過往以革命、戰鬥、反共的表現方式，更能說明他理念境界的崇高。無疑地，王德威也和前輩夏志清一樣，以對中國左翼傳統與寫實傳統的貶抑（但更為隱微），高揚了朱西甯所代表的抒情文化追尋模式，這一觀點本身與朱西甯地位的確立，如何可能悄然形成對台灣文學典範（甚且是中國當代文學典範）的移轉，便是一種值得考察的研究現象。關於類似的論述立場，以為朱氏的烏托邦書寫乃為維繫華族文化，並貶抑本土化運動為「去中國化」，黃錦樹的觀點也頗可一併觀之²⁸。

而提及朱西甯對民族文化的觀點，則朱西甯之受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影響問題，便也無可忽略。此一影響問題，與朱西甯受宗教信仰影響的問題一樣，在研究上都尚有很大開展空間。

²⁷ 王德威，〈畫夢紀：朱西甯的小說藝術與歷史意識〉，《紀念朱西甯先生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05），頁 29-30。

²⁸ 黃錦樹，〈身世，背景，與斯文：《華太平家傳》與中國現代性〉，《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6.05），頁 227-247。

莊宜文的〈朱西甯與胡蘭成、張愛玲的文學因緣〉(2003)一文，便詳論朱西甯與中國文壇著名的一對「怨偶」如何聯繫與受影響的過程。值得關注的是，本文提到朱西甯在六〇年代開始引介張愛玲文學，但受其影響則只是階段性的；不過，與胡蘭成在思想理念上的相通，如「世界文明史的正統在中國」等，才更是朱西甯七〇年代後創作與論述思想的基底：

胡蘭成不僅與他觀點謀合，其廣博學識與宏觀視野，更能言其所不能言，並提供其對抗現實潮流的依據，進而讓此階段的創作訴求獲得憑藉的力量。……自七〇年代開始寫作系列小說，亟欲透過創作傳達自身信念，接觸胡蘭成學說之後，他更以此對應時局。²⁹

如此一來，我們可以更清楚理解到，朱西甯並不像張愛玲那般只想成為一個出名的作家，他的文學乃別有懷抱，另有志向，而這志向當然與他承繼自對孫立人、胡蘭成的思想有關，也與他終生積極反共、戰鬥、傳教（此「教」可兼及宗教與華教）。至於朱氏與胡氏對朱天文、朱天心等「三三世代」的影響，以及後人的踐履、轉型，那就是另一則有關九〇年代後，台灣文學思潮與路線的新課題了。

四、現代性的寓言：朱西甯小說與現代主義思潮關連性的研究

除了反共與戰爭小說這獨特的書寫類型，及其鄉土小說所延續的鄉土書寫傳統與文化議題，使得朱西甯的小說藝術引人注目外。朱西甯另一項備受關注的焦點，乃是他小說裡心理寫實的功力，以及對文字使用進行實驗、鍛鍊的前衛實踐。代表作品有如《冶金者》(1970)、《現在幾點鐘》(1971)等。

²⁹ 莊宜文，〈朱西甯與胡蘭成、張愛玲的文學因緣〉，《紀念朱西甯先生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05)，頁143。

這些具有文學現代性色彩的成果，使他的作品有別於一般以寫實手法創作的同輩作家，但對於這些小說美學上的作為，是否能完全改變他在文學史上所代表的意義與形象？他是一個秉持特定文化信念創作的軍中作家？或是一個不斷求新求變的小說藝術家？亦或者兩者皆有，但有傾向比重上的差異？顯然就是讀者與研究者關注的焦點。

張大春的〈那個現在幾點鐘：朱西甯的新小說初探〉（1991），應當是較早以正式論文形式討論朱西甯之新小說語言的論者；甚且，此文一槌定音，至今張的平反觀點仍響應者眾。

張大春極力為朱西甯申辯之處，在於朱西甯的文學成就未受到足夠肯定。他認為朱西甯與司馬中原、段彩華被冠上「軍中小說三劍客」，有如被貼上顯著的「標籤路線」，或者被泛政治化地披上一層集團性色彩。凡此種種皆使六〇到八〇年代之間朱西甯的創作失去進一步被挖掘的機會。七〇年代台灣文學界籠罩在「本土自覺」的氛圍下，寫實主義美學與小說迅速發展，倘若不能明顯呈現這些理念，便會錯失批評家的青睞，而朱西甯在 1965 年之後的小說就是在如此氛圍下被「遺忘」的。換言之，張大春明顯的以台灣寫實主義文學思潮作為對照組，既欲提高朱西甯新小說之成就，也同時奚落、嘲弄了寫實傳統之文學觀點。對張大春來說，似乎是寫實主義陣營大盛，才導致朱西甯之小說橫遭冷落。

張大春並認為 1965 年後的朱西甯，已發展出一套新的文學語言模式，破壞了傳統的敘述方式，而別有一種敘事魅力。1968 年發表於《純文學》雜誌的〈哭之過程〉就是一個典型的範例。此篇藉由「天真敘述者」特殊的感性形式，進而營造一種柔膩婉約的散文敘述風格，使這片作品延伸出另一層作者感傷的敘述中所包含的深沉思考：

朱西甯在運用「天真敘述者」的技法之時，似乎並不介意將許多「不符合該敘事者身分、教養、背景、認知和感情的」材料裝填到小說裡去…；一

如他不介意在使用意識流技法時擴大了或度越了敘事觀點所能陳述的「內心活動」的範疇，因為朱西甯並不強調小說人物（角色）「再現」（或複製）現實人物（角色）的功能性，卻是透過那些細膩的、精準的描寫或摹擬筆觸來彰顯敘述本身的自由。換言之，故事、情節、人物……都是在為小說家的敘述效命的。³⁰

尤有進者，在〈現在幾點鐘〉裡，朱西甯把小說當成一個敘述語言的實驗場，他讓敘述觀點所寄寓的「我」馳騁其毫無節制的聯想或想像，透過這些「無關宏旨」，呈顯的不只是插科打諢的閱讀樂趣，更重要的是：這樣做徹底扭轉了讀者對於小說的期待，小說也由「宏旨」的陳腔濫調中解放出來。他因此認為，由〈現在幾點鐘〉開始，至少在「人物」、「情節」的退居次要地位、以及與小說「宏旨」無關的陳述，乃至於假意識流技法而呈現諸般支離破碎的經驗、現象等方面，朱西甯堪稱是台灣的第一位帶有法國新小說意味的小說家³¹。

張大春認為，朱西甯勇於以「沒事兒」的破格創意，早在六〇和七〇年代之間已悄然完成了他的小說革命。對於九〇年代初，後學的年輕作者著迷於「後設小說」（meta fiction）之新奇可愕，其實便不應遺忘前輩作家同樣的實驗精神。而這種重要的價值，卻是在寫實主義美學大興後被刻意遺忘的結果。

對於研究的角度來說，張大春的成果提醒我們必須注意朱西甯在語言實驗上的表現。然而朱氏對調動語言的興趣與六〇年代的現代主義思潮又帶有何種關係（朱西甯對西化的現代派也頗多批評）？為何白先勇、王文興等年輕作家的文字實驗獲得讀者肯定，而前輩作家的實驗卻似乎不能被同等對待？語言的前衛性與思想的前衛性對等與否（是否具有真正現代的文學、社會與族群意識？），有無可能是新舊兩代現代主義者真正的分野？這些無疑都是有待繼續深究的議題。

³⁰ 張大春，〈那個現在幾點鐘：朱西甯的新小說初探〉，《張大春的文學意見》（台北：遠流出版社，1992.05），頁 111-112。

³¹ 張大春，〈那個現在幾點鐘：朱西甯的新小說初探〉，《張大春的文學意見》，頁 121-124。

不過，在張大春之文後，陸續已有論者注意到朱西甯與現代主義思潮的關連。

陳芳明教授的〈朱西甯的現代主義轉折：重讀「鐵漿時期」的作品〉(2003)，文中特別提及朱西甯與六〇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家不同，並非受到美援文化影響，而是由魯迅與張愛玲那裡得到現代主義養分。而值得重視的觀點是，陳文不只如張大春那般把語言實驗當作文學的終極意義，他更指出這種現代性手法背後與朱壓抑的社會意識與政治情結間的關連。這種藉由整篇或部分的隱喻、象徵，而試圖達到對中國文化現代化，以及孫立人冤案的反省與批判，便是朱西甯現代主義小說的特殊定位所在：

從現代的觀點，他開始挖掘被壓抑的歷史記憶，以及被壓抑的政治欲望。

這雙重的挖掘，都未嘗偏離現代主義的技巧。³²

陳芳明這種提法的重要意義，在於提醒我們看待朱西甯文學中的現代性具有之政治與現實意涵，有助於解釋朱氏為何偏愛使用各種心理寫實與象徵性的寫法。但另一方面，或許也正在於朱氏這種面對中國現代化諸問題所採取的態度，如果只是一種對傳統的改良，而不是反現代性（真正的現代主義精神），則朱氏的現代主義是何種「現代」？這種政治隱喻式的現代主義和美援下的現代主義，對於他們所欲批判的現實問題，以及所欲顛覆的文學傳統，真具有激進的文學意義嗎？或最終仍不免是「技巧大於思想」的不反現代性的現代派？這問題就攸關台灣現代主義文學背後的思想傾向問題，其美學化的政治意義，有待進一步予以考察³³。

³² 陳芳明，〈朱西甯的現代主義轉折：重讀「鐵漿時期」的作品〉，《紀念朱西甯先生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05)，頁 186。

³³ 在新近出版的《台灣新文學史》中，陳芳明非常肯定的指出朱西甯：「他的美學思維從來不曾配合過當時的官方文藝政策，畢竟他的創作技巧帶有強烈的現代主義傾向」。但，這種論斷顯然

此外，張瀛太的《朱西甯小說研究》（2001，未出版）是學界第一部專論朱西甯的博士論文，針對說的敘述形式有較多討論，觀點有獨到之處。她的幾篇論文皆整理自博士論文發表，所論極為詳盡，對朱西甯文學研究有重要意義。其中，如〈朱西甯六、七〇年代的小說實驗：以〈失車記〉、〈本日陰雨〉、〈現在幾點鐘〉、〈蛇〉、〈巷語〉等作品為例〉、〈從敘事視角之運用看朱西甯小說的寫作技巧〉、〈從「行為演出」到「心理演出」：朱西甯 60-70 年代（早、中期）小說的情節經營〉，皆觸及朱西甯實驗性寫法中，有關從意識流到反情節和結構，去人物、存敘述等主要表現手法的意義。

不過，本文特別想提出〈從「傳統的現代化」到「現代的民族化」：論《華太平家傳》與朱西甯小說創作美學的轉變〉（2004）一文予以討論，認為其在敘述手法上的分析有與前述各種觀點對話的效果。張文提出了值得重視的另一種看法，便在探討這部遺作中理念與藝術無法和諧的原因。

論者首先提出小說主要三大內容，分別是文化典藏和史料掇遺、福音的中國化、西體中用。《華太平家傳》終於實踐了朱西甯「把當代人生活細微的留下來」的心願，以風俗誌記錄過去種種生活與民俗知識。他將舊社會下的鄉俚俗諺、讖語、村話、土話等解說記錄下來，成為一本傳統民俗百科全書。書中對於史料的處理，只是冷靜地呈現而不帶任何情緒反應，它們在小說的存在意義，無助於情節或人物性格的展現，卻像是為了「保存」或成為「知識」。

理念的部分，則是胡蘭成「大中國主義」的直接體現，《華太平家傳》是把朱西甯晚期小說的「基督教中國化」具體哲理化、論述化甚至論著化了。張瀛太以為，藉著傳統文化的認同與信奉，不只構成對民族母體的歸屬感，其只視中國文化為唯一出路的大中華意識形態，也延伸出了強烈的排他性：

就與本文前此所論，朱西甯出身軍中文藝系統，亦對反共志業深有望的思維傾向不相吻合。因此，其現代主義作品與官方文藝政策間「和而不同」的可能性與解釋力應更高。請參見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0），頁 588。

證諸於「三三」日後的言論，這種排他性可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排斥西化崇洋，呼籲民族自覺；一是對應於鄉土文學的本土化或偏窄化，以正統宏觀自居。而這樣的認同與認同之內容，正是構成朱西甯調和中國文明與基督教的理論根基，並形成藉以對抗鄉土文學和工農兵文學的「唯一出路」。³⁴

因此，張瀛太的研究試圖提醒，朱西甯的理念和信仰成就了小說美學的獨特性，卻也成為他藝術發展的牽絆。在很多時候，小說中是在「供養」這種基督教義與故國情思，而更甚於小說創作。不過，對一個終生秉此宗教化的文化信念的作者來說，這樣的小說形態恐怕也是「教義供養人」必然的抉擇罷。

在上述的實驗性語言美學觀的討論之餘，或許我們已意識到，積極要恢復朱西甯文學地位的論者，不無刻意將反共與鄉土文學類型作品摒除不論，再將朱西甯之前衛、非寫實等同於進步與高藝術性；而相對於此，則寫實主義與台灣本土題材的鄉土文學，則有意、無意被歸類到形式僵化，以及徒見政治不見美學的位置上去。

不過，這麼一來，朱西甯的反共與鄉土文學就只能繼續被掩埋，而這些類型文學所具有的高度意識形態色彩遂隨之被視而不見。塑造出帶有前衛色彩、高度美學性，不涉政治觀點的朱西甯形象，更能夠還原歷史的實情，而為朱西甯換得更高的文學位階嗎？或許，我們還是需要解決本身便是把美學高度政治化，也把政治高度美學化的朱西甯美學，辯證性地思考與把握，並重新加以深入剖析才可能產生出更具共識的基礎罷！

³⁴ 張瀛太，〈從「傳統的現代化」到「現代的民族化」：論《華太平家傳》與朱西甯小說創作美學的轉變〉，徐國能主編，《海峽兩岸現當代文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4.02），頁394-395。

五、小結：以文學與文化作為信仰的小說家

如果不要「污名化」反共文學與懷鄉文學，朱西甯以他第一代流亡者的身分，受難者的身分，當然無法避免以這樣的角度去書寫歷史。因而，將反共與懷鄉的書寫，寄寓著復興中華文化道統的使命，他的文學志業所在，絕非一個非文學的議題，因而必須因任何理由刻意迴避。相反地，恰恰因為朱西甯以書寫為信仰，以文化存續為志業，則他的反共小說與鄉土（懷鄉）小說已成為他美學與思想的堡壘，這正是他有別於依循國府主流思維的作者，而堅持自己衷心信仰的真理路線的價值所在。他的文學與思想價值首先應得到擁護者或反對者的尊重，卻不必因為愛之而必欲棄之以提高其純文學地位，甚或是厭之也必欲棄之以貶抑他諸多爭議性的作為，如此則我們才可能趨近於理解真實的朱西甯文學。

另一方面，對於美學成就方面的討論，實難與作者的政治思想、文化理念、宗教思想等截然二分。帶有使命感的文學，未必就是功能大於美學，從而不具有文學價值；同樣地，文學的技巧與語言的變化容或帶有多度的美學變革意義，也未必就等同於思想與內容的深刻與前進，因此便絕對必須獲得讀者肯定。朱西甯的文學，無可避免地與他流亡、軍旅、宗教、文化使命等際遇所形構的立場息息相關；甚且，他還堅持以一套形同信仰的理念來回應各種立場的挑戰，並未迴避與人論戰。那麼，刻意只談文化政治因素，或刻意只提純粹美學因素，這兩種研究取向，都難以兼顧到書寫主體所具有的複雜性。因此，關於朱西甯研究的進展，也實在到了朝更有彈性而務實的方向轉變的時機。

因此，朱西甯因其創作時間之長，橫跨類型之多，他可能同時兼具反共作家、鄉土作家與現代主義作家的面目，研究者勢必要更仔細的考察其不同階段之作品與思想，方能逐漸確認其文學史上的定位。

我們相信，好的文學必然不會寂寞。不過，好的文學不必然是眾人皆讚賞的作品，卻必然是誠實體現其藝術心靈的作品，張愛玲的人與文學似乎是朱氏的一個好典範。就這點而言，朱西甯文學與思想如若是誠實的藝術心靈之呈現，那讀

者與研究者向這一誠實心靈致敬的方式，毋寧就是誠心的閱讀，與回歸歷史脈絡的解讀。借用朱西甯早年的一段話來說：「因為那昔在、今在、永在的創世主，不斷向我們展現的新象，萬不是明日便舊了的新，也萬不是另起爐灶的新」³⁵。相信，誠實體現心靈的好文學便具有作者所欲訴求的恆久常新的價值，在文學的城邦裡必然不會寂寞，也終將換得屬於他應得的聲名。

³⁵ 朱西甯，〈一點心跡：《鐵漿》代序〉，《鐵漿》（台北：INK 印刻出版公司，2003.04），頁 17。原文刊於 1963 年文星書店出版之版本。

參考文獻

一、專書

- 王德威，《小說中國》(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3.06)。
- 朱西甯，《鐵漿》(台北：INK 印刻出版公司，2003.04)。
- 朱西甯，《破曉時分》(台北：INK 印刻出版公司，2003.4)。
- 朱西甯，《將軍令》(台北：三三書坊，1980.01)。
- 司徒衛，《書評集》(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9)。
- 魏子雲，《偏愛與偏見》(台北：皇冠出版社，1965.08)。
- 柯慶明，《境界的再生》(台北：幼獅文化事業，1977.05)。
- 張素貞，《細讀現代小說》(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10)。
- 張大春，《張大春的文學意見》(台北：遠流出版社，1992.05)。
- 黃錦樹，《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6.05)。

二、論文

- 王德威，〈畫夢紀：朱西甯的小說藝術與歷史意識〉，《紀念朱西甯先生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05)，頁 9-37。
- 王德威，〈一隻夏蟲的告白〉，《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11)，頁 99-104。
- 朱西甯，〈豈與夏蟲語冰？〉，《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11)，頁 93-97。
- 司馬中原，〈試論朱西甯〉，《文壇》第 42 期(1963.12)，頁 20-28。
- 陳芳明，〈朱西甯的現代主義轉折：重讀「鐵漿時期」的作品〉，《紀念朱西甯先生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05)，頁 179-195。
- 吳達芸，〈在君父的城邦：朱西甯《八二三注》的書寫策略〉，《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

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12)，頁 275-307。

吳達芸，〈書寫在異鄉：再讀朱西甯及《八二三注》〉，《紀念朱西甯先生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05），頁 63-94。

莊宜文，〈朱西甯與胡蘭成、張愛玲的文學因緣〉，《紀念朱西甯先生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05），頁 125-177。

張瀛太，〈文學中的戰爭與偉人：論《八二三注》的寫作意義〉，《國文學誌》第 7 期（2003.12），頁 261-283。

張瀛太，〈從「傳統的現代化」到「現代的民族化」：論《華太平家傳》與朱西甯小說創作美學的轉變〉，《海峽兩岸現當代文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4.02），頁 377-402。

應鳳凰，〈朱西甯早期小說及其反共文學論述〉，《五〇年代台灣文學論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7.3），頁 237-256。

三、其他

朱西甯，〈被告辯白〉，《中央日報》，1991.4.12，第 16 版。

丁善璽，〈朱西甯，放下你的面具！〉，《獨家報導》第 11 期（1987.03）。

陳國偉，《朱西甯系列小說研究：文學生命的寂寞單音》（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0）。